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中 “疆独”问题影响评估*

马丽蓉

摘要:自“7·5”事件以来,“疆独”问题日益被国际化。“东突”势力策动多起涉疆暴恐事件,已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造成极大影响。尽管内因是关键,但因“疆独”问题渗入了复杂的国际因素,其对中国内政外交,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及其成效均构成重大的制约。因此,如何在进一步提高治疆成效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国际反恐合作,既是优化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的当务之急,也是关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信誉的大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周边安全 “疆独”问题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12(2015)03-0109-120

作为“一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和平态势”的安全环境,除有内外之别外,还有软硬之分。“基于实力对比和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硬环境’”与“基于他国意图所塑造的‘软环境’”,旨在强调一国在国内外安全治理上所具有的能力与意图的两个方面。^①“崛起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有利,主要是看其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风险的大小。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家已有了相当实力,有可能已经摆脱了外部军事入侵的威胁,但该国卷入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不一定下降。”^②作为和平崛起的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不容乐观,尤其自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被国际化的“疆独”问题对这一中国全球合作战略的安全环境影响凸显,并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所面临的新挑战。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GJ03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0JJDGJW021)、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和上海市中东智库建设等成果之一。

^① 李永成:《意图的逻辑: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第72页,第121页。

^② 同上,第91页。

一、“疆独”问题被国际化的主要表现

“7·5”事件后，“东突”势力竭力将“疆独”问题臆造成“维吾尔问题”以达到使其国际化的目的，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维会”等在西方国家蓄意炒作“维吾尔问题”

“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主要采取窜访、议会作证、声援“东伊运”、策动“7·5”事件及组织研讨会等方式，竭力将“疆独”问题臆造成“维吾尔问题”。如2013年12月17日，由欧洲议会和无代表国家及民族组织（UNPO）共同举办题为“中国新领导人是否需要在维吾尔问题上进行改革”的研讨会，呼吁世界各国关注“维吾尔问题”。^①2013年12月31日，在瑞典伊斯兰联盟第33届大会上，维吾尔问题首次被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问题”的单元研讨议题，使“维吾尔问题与叙利亚危机成为会议重点讨论的四大问题之一”。^②在昆明“3·01”事件后，热比娅于3月4日在加拿大议会作证时宣称，该事件更像是“一群对政府失去希望的人的绝望行动”。在美国政府已承认“3·01”事件为“恐怖主义行为”的背景下，西方舆论对热比娅此番言论的处理相当低调且未加批驳。路透社4日以“热比娅担心中国政府动用‘铁拳’”为题发文，刊发热比娅谎话连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采访报道，再次显示了西方媒体颠倒黑白的超强能力。^③此外，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已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宣布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依法刑事拘留，有关部门将对其进行依法审理”，但是，“世维会”负责人借BBC等西方媒体的采访借机炒作“人权问题”，引发美欧社会对维吾尔学者遭扣查表示“深切关注”。

（二）土耳其一些民间组织与个人肆意助推“维吾尔问题”

事实上，土耳其同情和支持“东突”组织的社会势力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某些政治宗教势力，其中有貌似温和的教派组织甚至直接帮助“东突”恐怖分子成立组织；二是作为支持和参与“东突”反华分裂活动的传统社会力量“泛突厥主义”势力，如“民族主义行动党”、“大团结党”及“理想主义之家”等组织的激进分子，他们对凡有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事件都表现出极大关注，曾有不少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三是某些民间组织，如近年来十分活跃的

^① “欧洲议会举行有关维吾尔问题的国际研讨会”，<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2829>

^② “北欧穆斯林代表讨论维吾尔问题”，<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3214>

^③ “热比娅在加拿大议会为在昆明作案暴徒狡辩”，载《环球时报》2014年3月7日。

“人权、自由与人道援助基金会”等，^①由此形成土耳其境内助推“维吾尔问题”的社会土壤。近年来，土耳其媒体开始关注“维吾尔问题”，且向学界、政界等扩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库尔夏提·佐尔鲁（Kürşat Zorlu）于2013年12月21日在土耳其《新时代》杂志发表的题为“为了东突厥斯坦”的评论文章，首次提出“维吾尔区”概念、论及“维吾尔区的战略意义”，认为“维吾尔区是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的重要基地……如今维吾尔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维吾尔区成为了对中国而言极具战略意义且不可放弃的地区。”在他看来，尽管“维吾尔问题在土耳其外交部的工作中排在最后，外交部试图以‘视而不见’或‘临时政策’来对待此问题”，“但土耳其还是能在国际上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些工作，例如可以通过为维吾尔公共组织的活动提供场地来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可以影响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政策，这也算是对中国的帮助。”^②2014年1月1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在安卡拉成立了“楼兰语言培训中心”，为前往土耳其的留学生提供英语、日语、阿拉伯语、维吾尔语等培训，为维吾尔留学生及其他突厥语系留学生开设土耳其语培训班，为国内外突厥学研究人员提供维吾尔语言文化培训，以及为有意前往土耳其留学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等。^③

（三）“东突”势力的活动空间由特定区域向全球拓展

一方面，“世维会”等的活动重心由欧洲向美国、日本等国转移，且随着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因岛礁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关系而向东南亚地区拓展活动空间，并与当地的反华、遏华势力沆瀣一气，力图在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推动下为“疆独”问题国际化造势。其中，美国常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如美国总统多次接见热比娅等“东突”头目，美国国会多次召开有关“新疆问题”的听证会并要求联合国讨论所谓“维吾尔问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已成“世维会”的重要资助者且为其提供境外活动资金与发展舞台，美国国会持续关注热比娅及其在疆亲属的近况等。这些都为热比娅窜访特定国家、拓展活动空间等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东伊运”等的活动重心由中亚向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地转移，且受到“基地”分支的卷

^① “‘东突’势力祸乱新疆，西方和日本充当幕后黑手”，

http://www.guancha.cn/HuanQiuShiBao/2013_07_04_155687.shtml

^② “土耳其评论人士：维吾尔问题在土耳其外交部的工作中排在最后”，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3013>

^③ “维吾尔人在安卡拉开设语言培训中心”，<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3214>

土重来,伊斯兰国(IS)的迅速坐大,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泛起的影响,目前活跃在新疆境内外的恐怖组织包括“乌伊运”、“伊扎布特”、“哈里发斗士”及“东伊运”等,乘势搭上了IS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圣战”便车,竭力将涉疆暴恐事件纳入全球“圣战”中,不仅制造了新疆“圣战者”,还力图制造“新疆圣战场”,向全球拓展活动空间,且对丝路安全形成直接冲击。

(四)“东突”势力的政治诉求日益复杂多元化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世纪末的一种重要现象,苏东剧变更使亚非欧卷起了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从巴尔干半岛起,经小亚细亚、南北高加索、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细亚、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南洋群岛,直至南太平洋的一条斜线上,集中了当代世界诸多最突出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且多打着宗教旗号鼓动和争取国际支持,产生了车臣问题、库尔德问题等。近年的中东剧变,尤其是美国采取借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力量来打击IS的反恐新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又鼓舞和刺激了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意识,并对“东突”势力产生了直接影响。如“东伊运”改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后,其内部分裂为主张将新疆纳入全球“圣战”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全球派”和主张将新疆独立出去的世俗极端主义的“新疆派”。前者受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后者受中东库尔德分离主义的影响,反映出“东突”势力政治诉求日益复杂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他们关于在土耳其接受培训,赴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圣战场”获得实战经验后回国施暴等做法上却易达成共识,揭示出“东伊运”等打着“圣战”旗号来达到“以武求独”目的的实质。

总之,“7·5”事件后,“疆独”问题日益被国际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内外、软硬安全环境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疆独”问题产生影响的主要方式

事实上,通过恐怖活动来破坏新疆地区安定以分裂新疆是‘东突’组织的政治图谋,而将“疆独”问题国际化一直是其获取外部支持的重要手段。经过长期努力,‘东突’恐怖势力在德国、土耳其获得了合法地位,在加拿大、瑞士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组织或派驻机构,并与几十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但其也意识到自身在西亚、欧洲的发展已接近极限,且始终影响有限。”^①为此,“东突”势力采取不同方式策动暴恐事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产生了

^① 顾国良等:《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不利影响。

(一) 在两条战线相互策应

“9·11”事件后,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将中国公安部认定的“东伊运”、“东突解放组织”、“世维会”、“东突信息中心”等四个“东突”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却遭美方拒绝。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文指出,“东突”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得到了国际恐怖组织给予的军事和财政上的援助,包括接受“基地”组织提供的活动经费和人员培训,一些“东突”组织的骨干分子还参与了在车臣和中亚的恐怖主义活动。^①2002年8月30日,美方因发现“东伊运”曾图谋攻击美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而宣布将其列为恐怖组织。^②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并冻结其资产。2004年4月29日,美国宣布将“东伊运”正式列为国际恐怖组织。事实上,美国一方面将“东伊运”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另一方面又默许甚至纵容国会支持“世维会”等在美从事分裂活动,包括允许“东突流亡政府”于2004年9月14日在华盛顿宣布成立,美总统与副总统秘密或公开接见“东突”头目,将热比娅打造成“东突”组织“唯一领袖”等。美与“东突”分子的这种暧昧关系,造成“世维会”等极力结交讨好美国政府和社会。即使美国反对在本土安置关塔那摩监狱17名“东突”囚犯,“维吾尔美国协会”还致信鲍威尔:“在中东和南亚弥漫着反美情绪的时候,维吾尔人是世界上最亲美的穆斯林,将美国视为希望的灯塔”。^③同时,因“世维会”迫于国际社会压力而在表面上竭力撇清与“东伊运”的关系,暗里却相互勾结、彼此策应。近年来,“东伊运”在境外建立基地,培训暴力恐怖分子,不断派人潜入中国境内,策划、指挥恐怖破坏活动。^④但“世维会”却为“东伊运”的恐怖主义行径作辩解,误导西方舆论,抹黑中国形象,旨在用舆论战去策应“东伊运”的恐怖战。

总之,“东突”采取“一文一武、两线作战”的方式,也是为了用“两条腿走路”谋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塑造非暴力的“受害者”嘴脸,甚至与境外各种反华势力相勾结,诋毁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混淆视听涉疆暴恐事件,以博取西方某些大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与基地、IS等在叙利亚、伊拉

^① 顾国良等:《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第343页。

^② 同上,第355页。

^③ “UAA Letter to Sec Powell on Uyghur detainees at Guantanamo,” *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 December 8, 2003.

^④ “公安部查清‘东突’资金来源:拉登资助数百万”,中新网2008年10月22日。

克等“圣战战场”并肩作战，IS 头目还宣称要在几年内占领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广大地区，折射出其与“东突”的实质性联系，以及“东突”用两线作战来破坏中国“丝路战略”安全环境的这一事实。

（二）借地区动荡乘势作乱

美国于 2005 年推出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旨在“铲除中东地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但结果却使美深陷恐怖泥潭而难以自拔，“基地”、IS 等仍将奥巴马政府拖在了中东。2006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在南亚和中亚“具有前所未有的利益与价值”，^①并推出“大中亚战略”以维护美国在中亚的霸权利益。因此，中东、中亚爆发的“阿拉伯民主之春”与“颜色革命”均有美国新干涉主义烙印，并鼓舞“东突”势力将工作重心从土耳其、德国等转向美国，希望美国能像支持中亚国家搞“颜色革命”那样支持“东突”组织，“7·5”事件就可看到美在中亚鼓动“颜色革命”的影子。^②所不同的是，前者以示威游行方式推翻现政权，后者用打砸抢等方式“以武求独”。事实上，借“阿拉伯之春”来改善生存处境已成“东突”主要求生之道：（1）除与“基地”、塔利班等关系密切外，还通过“赴叙利亚和伊拉克直接加入 IS 武装”，“到东南亚参加 IS 在当地的分支”等途径与 IS 建立了组织联系以“扩展国际恐怖组织人脉，为其升级在中国境内的暴恐活动争取资金等”^③。（2）自 2012 年 10 月“基地”头目扎瓦赫里鼓动追随者“支持叙利亚兄弟”后，“东突”就向叙利亚派出“圣战”小组参战。2014 年 9 月基地也门分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统一战线”来对抗空袭“伊斯兰国”的西方联盟。^④“东突”分子也借助与“基地”、IS 的联系而出入叙利亚、伊拉克等“圣战战场”。（3）尽管中国三次否决联大涉叙决议草案并未影响到中国与海湾逊尼派国家的关系，且“得到了绝大多数海湾国家的重视”^⑤，但西方媒体却对中国涉叙立场作了“教派化的偏激性”解读，为“东突”分子赴叙利亚参加“圣战”制造了“借口”，使其借此构建了与中东热点问题的现实联系。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006), p.1.

^② 顾国良等：《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第 84 页。

^③ “东突分子投奔 ISIS 路线图曝光 最终目标打回中国”，载《中老年时报》2014 年 9 月 26 日。

^④ “极端组织欲联手对抗美国及盟友”，载《北京青年报》2014 年 9 月 18 日。

^⑤ 谭利娅：“美媒称中国否决涉叙提案不影响其与海湾国家经济关系”，环球网 2012 年 2 月 8 日。

可见，“东突”分子采取“借势作乱”的求生之道，使得一波又一波来自周边及大周边的恐怖主义浪潮程度不同地向中国“外溢”，且在中国出现了“洼地效应”，使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三）搭全球“圣战”便车“练兵”

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后建立了伊斯兰政权，使得“迁徙”成为令穆斯林引以为荣的重大事件并由此形成“迁徙情结”。又因“吉哈德”常被外界狭义地解读为“圣战”，目标是建立伊斯兰政权，“迁徙”便与“圣战”有了密切关联，“迁徙”成了“圣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迁徙”作为一种理念被再度付诸实践，并在埃及、阿富汗、车臣、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先后出现三次“迁徙”浪潮，“基地”、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多搭“圣战”便车而发迹。2014年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阻止外国圣战者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后对原籍国构成威胁的决议，旨在防止IS等以招募“圣战者”方式将其纳入全球“圣战运动”资金链、信息链与组织链，如“东伊运”与“基地”系“共生关系”，在培训武装人员和暴力恐怖分子方面得到了“基地”与塔利班的大力支持。“9·11”后，“东伊运”搭上“基地”所主导的全球“圣战”便车，将其人员派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基地”、塔利班训练地参加军事训练后潜入新疆建立暴力团伙，策动暴恐活动。近日，IS头目关于未来“伊斯兰国”的涉华甚至涉疆言论，不仅确证了其与“东突”存在联系的事实，还反映出“东突”为获取更多武器装备与活动资金而转投IS的投机事实，表明“东突”势力不仅危害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环境，还将对全球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四）随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泛起

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正，但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就存在极端主义思想、行为及其派别，尤其是“9·11”后在美国全球反恐威压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又成渣泛起，主要表现为：一是伊斯兰教义被歪曲，使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被引向极端主义泥潭，尤其是伊斯兰核心概念被误读（如“乌玛”内涵边界的模糊化、“吉哈德”概念的暴力化等），导致伊斯兰教义被歪曲。二是伊斯兰圣战思想被误读，使伊斯兰复兴思潮滑向政治化与极端化深渊。如哈桑·班纳认为“伊斯兰是信仰与领导、宗教与国家、精神与行动、祈祷与圣战、顺从与统治、《古兰经》与宝剑的统一体”^①。又如被誉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鼻祖”的赛义德·库特布在《路

^① 转引自钟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产生与发展”，载《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39页。

标》中赋予伊斯兰极端势力“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并号召穆斯林参加“迁徙圣战”。此外，赛义德·毛杜迪在《伊斯兰圣战》中全面阐述了具有自卫性和进攻性双重特性的伊斯兰圣战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恐怖行动提供了行动方式上的理论支持。”^①“9·11”后，萨义德·库特布等人的圣战思想被“基地”、IS等作了极端主义的解读与运用，伊斯兰复兴思潮滑向了政治化与极端化的深渊。三是“基地”、IS等迅速坐大，使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在全球施暴活动频发，“东伊运”在参与叙利亚、伊拉克“圣战”中与“基地”等密切了组织联系。可见，伊斯兰极端主义从民间、精英与组织等不同层面向外蔓延，使“三股势力”日趋极端化。因此，治疆须先治极端主义，须先“去极端化”。“宗教极端主义者在布道宣教的名义的掩盖、庇护下，利用宗教从事暴力恐怖、分裂国家等极端主义活动，就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②

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溯源性梳理，旨在认清“疆独”问题被国际化背后“东突”势力已随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泛起的事实。其歪曲教义、屠杀无辜等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之举，破坏了伊斯兰教的中正形象与和平本质，并对我国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造成重大冲击。

三、“疆独”问题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疆独”问题已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其根源主要包括“美国因素”、“中东因素”和“日本因素”。

“美国因素”主要表现为：（1）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引发“阿拉伯之春”所致。美国于2005年推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结果却是哈马斯等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劫持民主”与反美主义情绪的全球蔓延，直至“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中东出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反弹，使得“基地”、IS坐大，令“东伊运”备受鼓舞。（2）美国“大中亚战略”引发“颜色革命”所致。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在南亚和中亚“具有前所未有的利益与价值”^③，故推出“大中亚战略”。其中，“颜色革命”鼓舞“世维会”等将工作重心从土耳其、德国转向美国，且从“7·5”事件可看到美国在中亚鼓动“颜色革命”的影

^① 王旭：“毛杜迪的圣战观念和伊斯兰革命理论”，载《南亚研究》2012年2期，第8页，第12页。

^② 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第197页。

^③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006), p.1.

子。^①（3）美国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祸水东引”所致。“9·11”事件以来，美国面临蔓延全球的仇美主义和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大国对传统大国所带来的挑战等，把由“阿拉伯之春”复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祸水东引”也成为美国破解“越反越恐”困窘，遏制中国崛起之策。“基地”、IS 的全球性扩张，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入中国，并使“东突”成为西方“祸水东引”的工具之一；（4）美国在“疆独”问题上的人权外交所致。在“疆独”问题上，美国打着“人权”旗号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美国务院每年发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来诋毁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压制新疆维吾尔地区的人权活动”，美国学界借“新疆工程”对维吾尔族历史、语言文化传承、宗教信仰、就业和流动等展开研究，旨在将“维吾尔议题”政治化等。美国人权外交破坏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软环境，且使“疆独”问题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挑战。

“中东因素”主要表现为：（1）源发于沙特的萨拉菲主义。因极度强调教义纯洁性和文本经典的字面意义，萨拉菲派具有延展性、歧义性及超强认同建构能力等，且派生出传统的、政治的、圣战的三派萨拉菲主义（“圣战”萨拉菲主义又分出暴力与非暴力两派），如“基地”、IS、“东伊运”等均烙有暴力“圣战”萨拉菲主义影响之印；（2）源发于埃及的“希吉拉运动”。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圣战迁徙”浪潮影响至今，使“东伊运”等以培植新疆“圣战者”，开辟新疆“圣战场”的方式竭力将涉疆暴恐事件纳入全球“圣战”浪潮。（3）源发于埃及穆兄会的极端组织。埃及穆兄会衍生出“伊扎布特”、“伊吉拉特”等极端组织，前者被俄罗斯、中亚国家、德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视为恐怖组织，后者被俄罗斯定为非法宗教极端组织，中国也对这两个渗透新疆的极端组织予以防范和打击。（4）源发于“基地”、塔利班的资助与培训。“东伊运”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基地”资助、走私贩运毒品、抢劫等方式筹集，且“‘基地’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幕后推手”^②，“基地”所创建的“维吾尔训练营”多由“东伊运”分子组成，并被派往阿富汗等地参加实战，或潜入新疆进行施暴、建立暴力团伙、煽动骚乱等。^③近期，“东伊运”响应“基地”号召参与叙利亚、伊拉克“圣战”后回国施暴。（5）源发于土耳其的“双泛”思潮。兴于19世纪末的“双泛”思潮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篡

^① 顾国良等：《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第84页。

^② 王茜：“‘东突’问题发展演变与中东恐怖主义相关性透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6期。

^③ “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阿富汗委员会”，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790.htm

改为具有强烈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潮,并成为“东突”的思想源头与行动指南,“7·5”事件后,土耳其更成为“东突”培养“精神领袖”和骨干分子的大本营,^①凸显“双泛”思潮对“东突”的持久影响;(6)源发于中东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分离主义影响波及全球,且在“阿拉伯之春”中再次抬头。近期美国采取“借库尔德人剿灭IS”的反恐新策略,将会进一步助长库尔德分离主义并刺激和鼓舞“东突”势力。

“日本因素”主要表现为:“7·5”事件后,日本也从后台跳到前台与“东突”势力相勾结。如“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于2009年窜访日本,2012年上演捐款购岛闹剧,2012年4月日本自民党为配合“世维会”在日本举行大会,公然在其党部成立“日本支持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由该党议员古屋圭司任会长、安倍晋三任顾问等。可以预计的是,随着美日同盟关系的升级,“日本因素”也将相应趋强,并使中泰、中菲、中越等安全合作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东盟这一多边安全合作平台上的国际反恐合作成效大打折扣,使得危害陆、海丝路安全的国际因素间彼此牵制,异常复杂。

四、“疆独”问题的影响评估

(一) 新疆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缘战略价值凸显

习近平主席在新疆考察工作时强调,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大局,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亚欧成为大国博弈的新舞台,新疆作为“亚欧桥头堡”的地缘战略价值凸显,并成为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的一枚重要战略棋子。新疆在“丝路战略”中的战略价值内涵主要包括:(1)新疆与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等同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也具有国际体系转型中新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2)新疆是中国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地区,特别是跨境民族与宗教问题引发诸多事端,使其在历史上多成为诸多政治势力关注和争夺的焦点,极易卷入各种形式的国内外争端中。^②(3)新疆极为丰富的油气等资源优势决定其“将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接替区”^③,并对中国—中东、中国—中亚等能源管道安全提供重要保障。(4)新疆地处全球恐怖主义地带,使得“东突”势力既对陆上丝

^① 邱永峥等:“谁在帮‘东突’势力祸乱新疆”,载《环球时报》2013年7月4日。

^② 顾国良等:《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第61页。

^③ 蒋新卫:《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路构成安全挑战,还因“东伊运”随着“基地”正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对海上丝路造成安全隐患。因此,涉疆暴恐事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及其成效具有重大影响。

(二)“疆独”问题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力凸显

(1) 丝路安全合作已成为成功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俄面临共同的反恐难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中国的“疆独”问题)、拥有共同的反恐主战场(中亚、西亚、南亚等)与共同的反恐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等)等,故中俄联手反恐来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可能。(2) 丝路安全合作已成为中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2011年10月,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2013年9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前者旨在维护美国霸权利益,后者意在维护“命运共同体”利益,这是中美丝路战略根本区别所在。因中美缺乏战略互信,使得“美国因素”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中的销蚀力渐现,也使得被国际化了的“疆独”问题已成为美国“以疆遏华”的战略筹码。尽管2009年美国已将“东伊运”列入“恐怖组织”打击名单并冻结其资产,但实际上隶属美国国会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一直在资助“东突”势力,且“资助的组织逐步增多,金额越来越大。”^①因此,除综合治理外,中美合作反恐才是维护丝路安全的当务之急。(3) 丝路安全合作已成为构建中国与中东地区大国间新型关系的抓手。事实上,中国与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地区大国均属丝路上的“天然合作伙伴”,故应以丝路安全合作为抓手来构建中国与中东地区大国间的新型关系。以经贸、人文促和平已成为儒、伊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于丝路上的最成功经验。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应拓展经贸合作领域、深化人文交流内涵,并合力打击极端主义,共同维护丝路和平。

(三)“疆独”问题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影响力凸显

“疆独”问题被国际化后不断“外溢”,危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还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及其成效构成重大挑战,其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负面影响凸显。(1) 自“7·5”事件以来,涉疆暴恐事件中的国际因素日益显现。“疆独”问题被国际化是境内外反华、遏华势力合力所为的结果,“疆独”问题已由最初的“三股势力”分裂中国的核心关切扩散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渗入后对中国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并对中国周边外交形成重大冲击,其中关涉中美、中日

^① 刘强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对‘疆独’组织的资助”,载《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9期。

等双边关系,中国与上合、东盟、海合会等区域和次区域国际组织间的多边关系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2)“世维会”等“东突”分子惯以“受难者”面目在美欧搭台唱戏,搞舆论战,竭力将“疆独”问题国际化,并在土耳其、德国、美国乃至日本等不断寻找靠山,开辟生存空间。尤其是在热比娅上演“购岛闹剧”后,“世维会”与“藏独”等反华势力、日本政坛的遏华势力等相勾结,炒作“中国威胁论”,诋毁中国民族宗教政策,渲染“中国军力崛起”,并对涉疆暴恐事件妄加臆断,这些混淆视听的议题炒作,使得日本社会自上而下弥漫着厌华情绪,并向菲律宾、越南等国扩散,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华人华侨、华资企业乃至中国游客等被冲击、遭绑架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凸显中国周边外交中“疆独”问题的负面影响。(3)随着IS的强力东扩,“基地”向印度次大陆的拓展,“东伊运”的活动也将随之由陆上丝路向海上丝路发展,即由中国的大周边向小周边发展。伊斯兰极端主义由外至内、自西向东渗入中国周边邻国,中国周边外交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安全挑战。尽管“疆独”问题已对中国周边外交构成新挑战,但也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战略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双边、多边安全合作关系的“生长点”,故应抓住这一重要战略合作机遇,在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进一步开展国际反恐合作,使中国周边外交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能够大有作为,彰显“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外交风范。

结 语

尽管影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的内因是关键,但“疆独”问题因渗入复杂的国际因素而对中国内政外交产生了掣肘,甚至关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及其成效。在反华、遏华势力联手推进“疆独”问题国际化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新疆处于丝路核心带的区位优势、地缘战略优势与深化改革的“战略替代区”的资源优势等,在进一步提高治疆成效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国际反恐合作,将是优化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的当务之急。因此,“疆独”问题,不仅关涉国家核心利益,还成为关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信誉的大问题。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5年2月

(责任编辑:鲁茉莉)